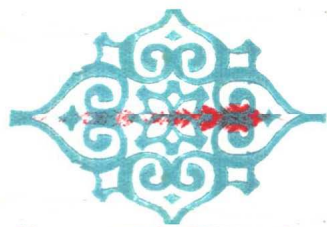


中国语文学家辞典

K825.5
C/C/1

中國語文學家辭典

陈高春



河南人民出版社

中国语文学家辞典

陈高春

责任编辑 刘一之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河南省新乡市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本 30.5 印张 500 千字

1986年3月第1版 1986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5,000册

统一书号9105·12 定价6.50元

序

“语文学”和“语言学”一样，都是从西方语言学中翻译过来的。英文，“语文学”叫做philology，“语言学”叫做linguistics。前者以文字和书面语言的训诂考证为研究对象，后者以语言本身为研究对象，虽然有区别，但也有密切联系。在有文字的语言里，不可能完全抛开文字和书面语言的训诂考证来研究语言本身。在我国尤其是如此。^①因此，有人在运用“语文学”和“语言学”这两个名称的时候，采取古代训诂家所谓“对言有别，散言则通”的办法，以“语言学”统摄“语文学”，如王力先生的《中国语言学史》就是这样。他在书的《前言》中说：“其中‘语言学’一词，是采用了最广泛的意义。”

王先生也强调“我们不应该轻视‘语文学’的研究”，尽管他所以强调的原因与我们略有不同。他说：“我们有五千年文化需要继承，文献资料的考证和故训的寻求，仍然需要有人去做，即以整理古籍而论，我们就需要训练一批具有语文学修养的人才。”他又说：“从语言理论方面看，中国古代也有很多可资借鉴的东西。在封建主义上升时期，也象资本主义上升时期一样，学术上有不少美丽的花朵。中国是

^①参看赵遐秋、曾庆瑞《中国语言学史读后》（《中国语文》1964年6期）

世界上语文学发达最早又最盛的国家之一，我们应该很好地继承祖国的语文学遗产，并且把它发扬光大起来。”我认为王先生的这个意见是很正确的。现在党和国家非常重视古籍整理工作，认为是子孙万代的大事，我们更应该象王先生所说的那样，很好地继承祖国的语文学遗产，并把它发扬光大起来。

陈高春同志这部《中国语文学家辞典》的出版，为研究中国语文学的专家、学者和学习古代汉语的青年同志提供了一种有用的工具书，我预料将会受到他们的重视，说不定会重新出现洛阳纸贵的现象呢。

这部书不仅网罗了历代语文学者一千九百五十余人及其有关著作五千五百余部。除传统的文字、音韵、训诂三门以外，兼及金石、校勘等，都按其作者的生卒年代逐次排列，并概述作者的生平及其著述的要略，比起清代谢启昆的《小学考》、黎经诰的《许学考》等书，规模要广阔得多，更非语言学所能概括，所以命名为《中国语文学家辞典》，虽不用语言学这个名称，而我国传统的语言学也都包括在内了。这在标题上可以说是与王力先生的《中国语言学史》异曲同工。

高春同志正当年富力强的时候，一九七九年以来数年之间，以工作之余完成这部七八十万字的大著，实在很不容易。承他厚爱，把手稿交给我看。读完以后，我不胜钦佩。由于成书的时间过于紧促，书中也难免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我以为主要是对语文学家的评价沿袭前人的比较多，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重新评论的比较少。这自然不是仓卒可就的，希望高春同志继续努力，不断修订。我相信，假以岁月，他是

能够完成这个艰巨任务的。

周大璞

1983年7月11日于武汉大学

前 言

——语文学及其沿革

一、语文学的性质和内容

语文学是我国传统的以书面语言为研究对象，而侧重在文献资料的考证和故训的寻求这样一门总的学科，包括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校勘学等。

在我国古代，语文学又称为“小学”，指教人认字的学问；西汉末刘歆《七略·六艺略》即标有“小学”一类。①

“小学”既是教人认字的学问，后来也就有称它为文字之学的。南宋藏书家晁公武说：

文字之学凡有三：其一体制，谓点画有纵横曲直之殊；其二训诂，谓称谓有古今雅俗之异；其三音韵，谓呼吸有清浊高下之不同。论体制之书，《说文》之类是也；论训诂之书，《尔雅》、《方言》之类是也；论音韵之书，沈约《四声谱》及西域反切之学是也。三者虽各名一家，其实皆小学之类。（《郡斋读书志》卷四）

晁氏之说，本诸《隋书·经籍志》。②从此，“小学”的范围逐渐扩大，成为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的总称，所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把小学类分为训诂之属、字书之属、韵书

注：①见《汉书·艺文志》序。

注：②《隋书·经籍志》把小学分为体势、训诂、音韵等类，体势即体制。详《隋书》卷三十二。

之属。三者虽各有侧重，但相互间的界限是不十分明确的。

一般说来，语文学的研究，目的在沟通古籍，使今人能读懂古代文献，因此，中国的“小学”又一向被认为经学的“附庸”。

语文学在清代又称为考据学。清末郭嵩焘说：

自乾隆盛时，表章六籍，老师大儒，承风兴起，为实事求是之学。其间颛门名家言考据者又约有三途：曰训诂，研审文字，辨析毫芒；曰考证，循求典册，穷极流别；曰雠校，搜罗古籍，参差离合。三者同源异用，而各极其能。（重刻《郡斋读书志》序）

这门学问以考证为中心，而尤重汉儒传注，因此称作“汉学”。又因为这门学问讲究实事求是，所以后来人又称它为“朴学”。

语文学通常也叫做传统语言学。陆宗达先生说：

传统的“小学”分成了三个互相有分工又有联系的门类：文字、音韵、训诂。这三个门类的总合，就是我国初具规模的传统语言学。（《训诂简论·一》）

传统语言学与现代语言学不同，它研究的对象是以文字为主，兼及语言；研究的内容是文字的形、音、义；研究的方法主要是考证。而现代语言学则不然，它研究的对象是以语言为主，兼及其它；研究的内容是语言的内部规律，目的是科学地、系统地、全面地探讨语言理论，指导语言实践；研究的方法是描写、比较等多样化的。在我国语言学史上，清末以前，属于传统语言学，而且应该包括在语文研究的范围之内。

训诂学是语文学的中坚，也是语文学中一个比较特殊的门类，由于历史悠久，它研究的内容十分丰富，研究的范围

极其广泛。清末张之洞解释“训诂”二字说：

诂者，古言也，谓以今语解古语，此逐字解释者也；训者，顺也，谓顺其语气解之，此逐句解释者也。

（《轺轩语·语学第二》）

可见，所谓“训诂”，不只是究明字义，还兼及于语法。训诂学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的训诂学，就内部而言，包括了后来的文字、语音、词汇，甚至语法、修辞等；而外部，则与文献、校勘、目录、考据等关系密切，它们之间界限也是不易分清楚的。至明、清以后，训诂学逐渐形成为“小学”三类之一的独立学科，而语法、修辞等学科，却从训诂学中逐渐独立出来。就研究方式而论，训诂学又可以分为“随文释义的注疏和通释语义的专著”两类。^①随文释义的注疏，指的是以解释古代典籍词义为主的传、注、笺、疏等，如相传为西汉毛亨的《毛诗故训传》，南朝梁刘峻的《世说新语注》，唐孔颖达等的《五经正义》、李善的《文选注》，清孙星衍的《尚书古今文注疏》、刘宝楠的《论语正义》等；通释语义的专著指的是将前人对字义的解释，按一定的方式编排出的字书，即后来所说的字典、词典，如《尔雅》、《说文》等。近人胡朴安先生说：

溯训诂之原始，当是七十子以后学者的传授，而训诂之发展，是在东汉古文家勃兴时代，贾逵、马融、许慎，皆是训诂学大家，而郑玄尤能集周秦两汉训诂之大成；唐之陆德明、孔颖达、贾公彦，亦能集魏晋南北朝训诂之大成；就是宋朝道学家，偏于义理之解释，虽不

注：①参见周大璞先生《训诂要略·训诂体式上》，湖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是正统之训诂，而亦是属于训诂之范围。至于清朝汉学家之著述，如正续《皇清经解》内所收，大半皆是训诂学。（《中国训诂学史》自叙）

胡氏的话很能说明问题。

校勘学兴于两汉，昌于唐宋，盛于清代。典籍的校勘，是文字、音韵、训诂等的综合运用。为了鉴别古籍的真伪，学者们往往辨别字形，推求字音，审理字义，以求得古书的真实面貌。因此，校勘学也是语文学中的一个重要门类。

语文学中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门类，即金石学。金石学兴起于我国北宋嘉祐（公元1056——1063年）间，后来的经学家往往利用金石学研究的成果来解释经典词义，如南宋朱熹《诗集传》中就多次引到北宋末薛尚功的《钟鼎款识》。至清代，金石学与文字学的关系就更加密切了，出现了大量的金石文字学著作，如顾炎武的《金石文字记》、王昶的《金石萃编》、邢澍的《金石文字辨异》、孙星衍的《寰宇访碑录》等。到了清末，由于甲骨文的出土，兴起了古文字学的研究。古文字学的研究大体可分两途，一是拿古文字以研究古代社会的历史；一是拿古文字以证楷书汉字的形、音、义。由此可知，这门学问实际上已超出了语文学的范围。

二、语文学的产生和发展

汉字数目非常多，形体又极其复杂，用它所记录下来的古人语言，即作为古典文献而保存下来的经籍，使人们阅读起来碰到很多困难；又由于时代遥远，字的形、音、义都有了变化，古书更不易被后来人理解。这就必须要有一批人去

做研究和整理的工作，编出分析汉字形、音、义的专书，并且把古典文献翻译成当时的语言，使人们能认识汉字，能通过自己的语言去理解古书的意义。于是语文学就应运而兴了。

语文学的产生，在我国历史上渊源很早，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已经有了语文学知识的萌芽。春秋以前，因去古未远，加上书籍不多，人们容易读懂它，因此不可能产生语文学。而春秋战国时代，各国争雄，加之社会矛盾的激化——奴隶与奴隶主的斗争，新兴的地主阶级的革新与奴隶主阶级的保守之间的斗争，使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社会的变革必然会反映到思想领域，进而影响到知识分子。因此，当时的学术界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产生了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名家、阴阳家、农家、纵横家、杂家、小说家等学派。学者们出于政治的目的，往往借字义的解释来阐明一种哲理或政治主张。这在先秦古籍中不乏其例。同时，也有说解某一书的，如《春秋》有左、公、穀三家传；《周易》有子夏传；《墨子》注解《经上》有《经说上》，《经下》有《经说下》（“说”即注解）；《管子》注解《牧民篇》有《牧民解》；《韩非子》注解《老子》有《解老篇》等等。不过，这些注解，有的是理论上的阐明，有的则是以故事来论证，还没有自觉地、充分地注意到字义的训解。^①战国以后，语文学才真正从一种知识的萌芽逐渐得到发展。

语文学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紧密相联，一个朝代的政治倾向，政策方针，学术风气以及社会的动乱与安定等，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语文学的发展。语文学作为一门总的学科，它的发展，在我国历史上，从秦代到清末，共历两千多年。

注：①参见周大璞先生《训诂要略》。

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并不是直线上升或下降的，而是有着很强的阶段性的。由于种种原因，它的兴衰，每一阶段都有自己的特点，有兴有衰，有全面发展的，有其中某一门类得到发展的。就发展阶段而言，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一）启蒙期，（二）盛行期，（三）中衰期，（四）复兴期。这种分期，是以语文学的内容和语文学在每一个阶段的兴衰作为标准的，因此与历史的分期不同。此外，这种分法并不是绝对的，阶段与阶段之间不能完全割裂开来。

（一）启蒙期 战国末至西汉末（公元前二世纪至公元一世纪初）。在这两百多年里，秦王朝的统一和灭亡，刘汉政权的建立，以及秦、汉统治者所实行的一系列的政策，使文字、训诂之学得到发展。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统一天下以后，为了维护和加强他的统治，采取了废除分封制、实行郡县制，统一文字、货币和度量衡，颁行“挟书之律”、“焚书坑儒”等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焚书坑儒”和“挟书之律”，使古籍大多散佚，就当时而言，阻碍了语文学的发展；就后来而言，又是西汉训诂兴盛的原因之一。文字、货币、度量衡的统一，促进了语文学的发展。改大篆为小篆，隶书的诞生，对汉字的简化和语言的统一不无好处，其作用自不待言。重视文化教育原是秦的传统，远在春秋战国之间，秦国就有《史籀篇》那样的童蒙识字课本，到了秦末，又出现了《三苍》，即李斯的《苍颉篇》、赵高的《爰历篇》、胡毋敬的《博学篇》。^①从此，产生了启蒙期的文字学。

注：①汉人称李、赵、胡三书为《三苍》；后又有西汉末扬雄《训纂篇》和东汉贾鲂的《滂喜篇》，后来人又称此二书合秦时《三苍》为《三苍》。

刘汉政权的建立，巩固了封建制度，发展了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而语言文字的变化也比较大，隶书逐渐代替了篆书，古文、奇字已经成了“古董”，加之去古渐远，古音古义已不被一般人所理解。这些情况，促使语文学发展起来。

文字方面，继秦《三苍》以后，又相继出现了司马相如的《凡将篇》、史游的《急就篇》、李长的《元尚篇》、扬雄的《训纂篇》等字书，其内容都是三字、四字或七字一句的韵语，其作用仍然是供童蒙识字。

训诂方面，统治者为了笼络知识分子，一反秦人政策。惠帝除“挟书之律”，文、景广开献书之路，书籍渐出。到了汉武帝帝章《六经》，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立五经博士，因而出现了不少有关儒家经典的注解，仅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就有百余家，近两千篇之多，训诂之学风行一时。由于对古籍的注解多了起来，就有人做汇集各家注解为一编的工作，于是《尔雅》、《小尔雅》一类的训诂专著问世了，这是训诂学发展的一大飞跃。《小尔雅》不传，今本从伪《孔丛子》中录出；《尔雅》流传了下来，从体例到内容，给后世影响很大，至今仍有研究价值，是不朽之作。这里还要提及的是西汉末扬雄的《方言》。《方言》一书，较之《尔雅》，同样是一部训诂学著作。其体例同《尔雅》，所不同的是，并非用当时的语言解释古语，而是用“通语”（即当时的普通话）解释方言。《方言》的全称是《辘轳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它记录了很多方言词汇；用我们今天的眼光看来，它不仅是对训诂学方面有很大贡献，而且在汉语史，尤其是在词汇史、语音史的研究上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此外，刘向、刘歆父子校中秘书，初步建立了校勘学和目录学的体系，这是因为书籍越来越多的原故。刘氏校书的方法大致是以下三个方面：（一）根据许多版本，互相对勘，改正错误，补充遗漏，删除重复；（二）古书多没有载篇名、书名的，他们按照内容给分加篇名、书名；（三）撰写内容提要 and 介绍批评的文字，并叙述学术源流、派别等。在目录学上，刘向首创“别录”，歆再创为“七略”。“别录”不传，“七略”还较完整地保存在《汉书·艺文志》里。刘氏父子的校勘学和目录学，对后世的影响都很大。

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是：〈1〉文字统一，书写简化，隶书盛行；出现了童蒙识字课本一类的字书。〈2〉注重对儒家经典的注解，训诂讲微言大意，但夹杂阴阳迷信色彩。〈3〉产生了通释语义的专著——《尔雅》、《方言》等。〈4〉产生了校勘学和目录学。

（二）盛行期 东汉初至唐代中叶（公元一世纪初至公元七世纪末）。在这七百多年里，社会几经改朝换代，而每一朝代的政策，又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语文学的发展。西汉末年，今文学家的谶纬说盛行，把训诂引向了歧途；东汉经今古文学的斗争，古文学的胜利，又使语文学向朴学的方向发展。东汉末黄巾起义，董卓之乱，三国争雄，使部分学者走向“清淡”，而清淡之风的盛行，对训诂是一大打击。六朝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异常激化，统治者为了缓和矛盾，用儒、佛、道的学说麻醉人民，笼络知识分子，有的甚至亲自讲经，而儒、佛、道三家的学说互相影响，互相渗透，因此，产生了义疏之学。东汉佛学的输入，为反切的产生提供了借鉴的条件。六朝文学的兴盛，尤其是“四声、八病”的学

说兴起，使韵书新作大量产生。唐代轻学校重科举，引起了学者对《切韵》的重视，因而为其增字加注者极多。隋、唐人崇尚佛学，因梵语的启发而产生了字母之学。

文字学的发展，东汉以后凡分两途：其一，由于时代的变迁，秦时的童蒙识字课本不易被人理解，于是就有人或是为其作注，或是编纂新的识字课本。自扬雄作《训纂》，班固又续《训纂》为十三章；别有贾鲂的《滂喜篇》。此外，王育替残本《史籀篇》作解说，杜林有《苍颉训诂》、《苍颉故》，魏张揖有《埤仓》、《古今字诂》，晋郭璞有《三苍解诂》等，大都是《三苍》的补注本。其二，东汉许慎以《苍颉》、《训纂》等篇里的小篆为主，而补以竹简、古文和《史籀篇》，基于六书说而作《说文解字》。许慎是古文大师贾逵的弟子，也是古文学派的健将，他的《说文解字》，正是应经今古文学的斗争而诞生的。《说文》的问世，使文字学向前大跨进一步，字书不再是仅为教学童识字的“小学”，而是探求文字的形、音、义，整理古代典籍的学问。

《说文》之后，又有晋吕忱《字林》、梁庾俨默的《演说文》、陈顾野王的《玉篇》、六朝时佚名的《说文音隐》等，这些著作除《玉篇》外，大都无所发明，不外乎是增字加注，因此都已亡佚。《玉篇》原本也已失传，今传本是宋初陈彭年等的删节本，但唐人所写原本《玉篇》还存残卷。从残本我们可以看出，顾氏之书仍是为《说文》作注的，但其中例证之丰富，却是《说文》所无的。隋、唐两代没有什么重要著述，仅唐人李阳冰作过刊定《说文》的工作。李氏擅长篆书，但多臆出，他刊定的《说文》错误很多，南唐徐锴《说文系传·祛妄篇》中就指出有五十多处。虽然如此，在

《说文》渐趋失传的时候，李氏能为其书篆刊定，却也功劳不小。李氏之后，有李腾（阳冰侄）的《说文字原》，对《说文》的部首作了一些考证的工作。唐代还有张参的《五经文字》和唐玄度的《九经字样》，二书都是供太学生读儒家经书之用的字典。

还须提及的是汉魏六朝有不少研究俗语俗字的学者，其著述之富，仅《隋书·经籍志》记载，就有三十余家四十多部，可惜这些书大都亡佚。

此外，东汉以后，书家辈出，篆、隶、真、行、草诸体大备，给字形的改革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至唐代，真楷已成为人们常用的书写字体了。

训诂之学，在这一时期几起几落。由于汉初崇尚黄老之学，西汉末佛教又开始输入，学者们喜用阴阳家的学说解经，用阴阳术数的理论来预决吉凶，出现了谶纬之学，使训诂杂入迷信色彩。西汉的经文有用隶书书写的，也有用古文书写的（古文即籀书）。用隶书书写的叫做今文经，用古文书写的叫做古文经。今、古文经学各有师传，官学中传授今文经学的五经十四博士，称今文学家，民间传授古文经学的学者，称古文学家。西汉末刘歆校中秘书，发现了大量的古文经书，因而开始提倡古文经学，建议官学设立古文经学博士。但刘歆的倡议遭到了今文学家的反对，于是经今古文学之间开始斗争，一直延续到东汉末年，古文家终于取得了胜利，在官学中被立为博士。经今古文学的斗争，使东汉成为训诂勃兴的时代，训诂一变而为实事求是的朴学。当时的大家有郑兴、郑众、贾逵、卫宏、许慎、马融、卢植、服虔、郑玄等人，他们有的是专注一经，有的是兼治数经，而注解的重点在研

究章句训诂，考证名物制度，大量著述反映了时代的精神。尤其是郑玄，博大精深，遍注群经，治学不主一家，著述之富，时推第一，堪称集经学训诂之大成。

东汉末战争频繁，社会极不安定，许多学者有厌世之感，因而“清谈”之风渐盛，“玄学”之势日兴，竟使训诂之学降为末流。

魏晋以后，学术界儒、佛、道三家鼎立，但又互相影响，加之当时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激化，统治者为了笼络知识分子，麻醉人民，缓和社会矛盾，大力提倡儒学、佛学、玄学，因此注解的范围越来越大，遍布于经、史、子、集，乃至佛教的经典。同时，因为前代的传注文字简奥，文义难明，读者已不能直接通过它去理解经文，于是产生了兼释经、注的义疏之学。南北朝经学分立，北朝经过十六国的割据，到北魏时，道武帝始设大学，置五经博士，后设立乡学、小学，教养诸生，优待学者，奖励儒学。于是学者辈出，如魏刘献之，梁徐遵明，齐李铉，周沈重、熊安生等，都是当时的名家。南朝宋、齐两代，儒学尚未普及，到梁武帝时，始开五馆，立国学，置五经博士。当时的学者有梁崔灵恩、皇侃，陈沈文阿、戚衮、张讥、刘焯、刘铉等人。他们著述极多，仅《隋书·经籍志》所载，就已“更仆难数”了。但大都亡佚，仅皇侃的《论语义疏》和《礼记义疏》尚存，熊安生的义疏，则见于《礼记疏》中。南北学的区别在于“北人俗尚纯朴，无浮华的习气，而经学又专宗郑、服，远有师承，所以能够穷理尽微。南人尚虚谈，宗老、庄之说，而治经又守魏晋经师之说，所以喜谈新理。”^① 隋的统一，南北

注：①见杨东莼《中国学术史讲话》第五讲。